



# 奥尼尔议长自传

# 奥尼尔议长自传

蒂普·奥尼尔口述

威廉·诺瓦克执笔

乔国强 王采文译

知识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具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蒂普·奥尼尔的自传。书中记述了奥尼尔在哈佛读书至成为美国民主党领袖人物的55年的政治生涯,着力描写了肯尼迪家族的影响及他与肯尼迪家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再现了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各个美国总统的形象,记录了美国的议会制与形形色色的竞选的内幕,披露了白宫和国会山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尤其是对卡特和里根的描述,更是当今难得的真实生动的资料。读者可从其的回顾和描述中,窥见美国历史之一斑。

### 奥 尼 尔 议 长 自 传

蒂普·奥尼尔口述

威廉·诺瓦克执笔

乔国强 王采文译

知 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10 字数 315 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70

ISBN 7-5015-0390-7/K·15

定价:8.90元

# 序

1986年10月18日，随着第九十九届国会的闭幕，我的长期的政治生涯也终告结束。我从事公众事业五十载，其中有34年做国会议员，10年担任众议院议长——我连任议长的时间是自1789年以来最长的。

真的，我那一天离开议会很不容易。我的同事们对我不乏溢美之词，但在我聆听他们的褒扬的时候，却一直在回想着我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其他一些时时刻刻。

1934年，在我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时，我便萌生了终身从政的念头，自那一天起，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我到华盛顿拜访亲友，我们的邻居米西·利汉德当时作总统秘书，她曾对我说：“如果你到华盛顿来，就往白宫给我打个电话。”

我跟她联系上后，她便邀请我去参观白宫。我到达那儿时，米西正在大门口等我。

我走进白宫后，她说：“你想见见总统吗？”

我瞠目结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对我来说象是上帝。

“现在科德尔·赫尔在他那里，”她说，“等他们一谈完话，我就带你进去。”

当我看到总统坐在轮椅里时，我惊讶得闭不上嘴。象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一点也不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个残废。在当今电视时代，这是很难想象的，但在过去，为了官方的面子，总统的缺陷是要保密的。

19年后的1953年1月3日，我作为国会议员，投下了第一票——支持山姆·雷伯恩作议长。但由于共和党人自1952年艾森豪威尔获得压倒优势以来，一直控制着众议院，结果是马萨诸塞州的乔·马丁当选了议长。

在马萨诸塞州州议会发展史上，我第一个担任民主党议长。4年后，亦即在我40岁时，我又来到华盛顿。在家乡时，我通过努力工作，逐步使自己成为州里第二号最有权威的人物。但眼下，作为一个少数党的新议员，我孤独无靠，地位低的不能再低了。我知道我的才华只好暂时埋没一下了。

在我参加的第一次干部会议上，山姆·雷伯恩对民主党议员训示说：“现在，我们是少数党，但我们对议院仍然起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记住，任何公驴都能踢翻谷仓门。这就需要木匠去做一扇新的。”

几天后，任期将满的哈里·杜鲁门邀请民主党新议员到白宫做客。老哈里如同他的声望一样活跃非常，那

一天他骂了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我喜欢老哈里，不仅是因为他所完成的一切事业，还因为他是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位被低估了的总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伟大之处却日益显露出来。

在艾森豪威尔时代，民族显赫，经济昌盛。人们将缅怀的与其说是艾克的政治领导，倒不如说是他的军事才能，但他说话却不中肯。不过，他曾完全正确地告诫人民，军火工业联合企业有不断增长的危险。

杰克·肯尼迪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有一种人民所喜爱的魅力。不仅仅我国人民喜爱他；在他三年任职期间，肯尼迪鼓舞了整个世界。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杰克时的情形。他长得瘦骨嶙峋，完全还是一个好害羞的小伙子。他那副样子，想象成一个中学教师就已经很难了，别说想象成一个总统了。他的成长就象我所认识的其他无名之辈一样平淡无奇，但终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之一。

自此以后，我结识了所有的总统——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吉米·卡特和罗德·里根。我同他们每一位都共过事，对他们的优点和弱点都做过仔细的观察。

数年来，我在这座大厅里投下了许多张选票。我在众议院里呆的最后一天，考虑的仍然是国会事务。新作众议院议员时，我反对过众议院常设委员会关于为联合国—美国行为法案增加基金的要求。那次投票很不愉

快，因为我家乡选区的选民相当保守。我的大多数选民都支持参议员乔·麦卡锡的反共运动。

不过，我对自己所投的大多数票都还算感到心安。因为我是作为一个新政开明人士来到华盛顿的。我认为政府有义务帮助不能照料自己的人们。尽管三十四年中风云多变，但我至今对此仍然坚信不渝。

对我来说，最后一次敲响议长所用的小木槌是十分困难的。但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天，同事们中洋溢着友谊与支持，和千百万民众从全国各地写来的信件，感谢我所做出的一切成就并祝我安度晚年等，所有这一切又使得我的离别轻松些了。

离职仪式进展缓慢，因为有太多的朋友要在会议期间道别——不但有民主党议员，而且还有共和党议员。几年来，我到过许多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中相互对立的党派彼此很少讲话。他们总是惊讶地看到，在我们国家，民主党议员能与共和党议员交朋友。

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政体的特别伟大之处。没有积怨或仇恨——只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在作积极的斗争。你的观点可以不同于我的，但我们仍然能够相互尊重，一起工作，这就是议会的本质所在。

在华盛顿期间，我参加过数百次辩论，其中有不少次辩论十分激烈，很不愉快。但是，在我心中并没积下半点怨恨，相反，我对议会及其所代表的政体充满钟爱之情。

我将永远自豪地称自己为众议院议员。

---

## 目 录

序.....	1
第 一 章 所有的政治都是当地的 .....	1
第 二 章 詹姆士·米歇尔·柯利和在州议 会的岁月 .....	24
第 三 章 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长 .....	53
第 四 章 肯尼迪家族 .....	75
第 五 章 通向国会之路.....	109
第 六 章 国会中的巨人麦科马克与雷伯恩 .....	123
第 七 章 在华盛顿的生活.....	149
第 八 章 肯尼迪总统 .....	175
第 九 章 林登·约翰逊.....	192
第 十 章 走上领导岗位.....	223
第 十 一 章 水门事件 .....	253
第 十 二 章 担任众议院议长.....	294
第 十 三 章 卡特年代 .....	321
第 十 四 章 罗纳德·里根.....	357
结 束 语 我的信念 .....	406
译 后 记 .....	409



## 第一章

---

# 所有的政治都是当地的

1927年我在哈佛大学工作时第一次决定从政。

我不是哈佛人。但我出生和生长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北的一个稳定的大部分为爱尔兰血统的工人家庭里，邻近哈佛大学约一两哩远。14岁时，我在哈佛找到一份整修场地的工作，剪草和修葺树篱。这项工作很费力，每小时只挣17美分。

在6月的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在做着每日的苦差，可那些1927年入校的新生却聚首于一个巨大的帐篷里在庆贺新学期的开始。我能看到里边有成百个年青人身着白色西装，围成圈站在那儿又说又笑，同时也喝香槟酒，这在禁酒时期的1927年是非法的。

就象发生在昨日一样，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仍然能感到那时所感到的愤懑。我写这些的时候，事情几乎已经过了60年了。真正使我恼火的是那些非法的香槟酒。我对自己说，这些人究竟把自己看成什么了不起的人了，以致于法律都对他们毫无约束？

虽然从在哈佛工作的地方走到家只需要20分钟，但剑桥北真好比是在月球的另一边。就工人的生活水平来说，我的邻居相对来说已算殷实，但不需走出多远就会发现人们囊空如洗。每个城

镇都有自己的贫民院，当然，那时没有类似健康保险或社会福利之类的东西。人到65就得靠家人赡养，否则算你倒运。

我们也有一些人流落街头，象酒鬼老巴伯·伯克。他常常呆在邻舍外面。有一年冬天十分寒冷，清晨我上学时，他截住我说：“蒂普，你能给我5分钱买杯咖啡喝吗？”

我身上只带了吃午饭用的一角钱，但我还是给了他5分。我问他：“你昨晚在哪儿睡的觉？”

“在牲口棚里，”他说。

“天哪，巴伯，”我说，“那儿一定很冷。你盖什么呢？”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远忘不了他的那句回答：“报纸，”他说，“不过他们没有象往常一样往外倒报纸。”

在哈佛大学开学的那天，当我看到那些享有特权、踌躇满志，煞有名牌大学学生派头的北方佬个个摆出一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架子时，我就暗自下定了决心。我发誓，总有一天我能通过努力工作，保证让我自己的人民也能够进入象哈佛大学这类的地方，享有被这些年轻人视为当然的学习机会。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更知道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1845年，我祖父和他的两个弟兄被新英格兰制砖公司从爱尔兰带到此地。祖父在剑桥墓地买了一小块土地，我至今还存有那张契约。在土豆饥荒年代，移民见到的死人太多了。他们到达美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小块坟地备用。

我祖父在剑桥北定居，在一家制砖场工作。他们干活所用的工具只有镢、锹和手推车。他们将粘土拌和起来，弄软，然后再放入窑中烘烤。我父亲出生于1874年。他年轻时也在砖场工作——用镢和斧挖掘粘土，然后装到吊车上由一匹马从洞里拉到坡上。

但是，爱尔兰人不想再让他们的孩子呆在洞里干这种掘土工作。大约在1900年，这些工作就被讲法语的加拿大人接了过去。20年后又是意大利人。他们每一代都让自己的孩子脱离这一行，让他们受教育，作牧师、律师或医生等。银行与保险业都属于当地的旧贵族、波士顿的文人雅士以及北方佬。

我们的一部分邻居，那些住在克莱街和蒙哥马利街周围的老辈人仍然讲盖尔语。但他们从不鼓励子女讲这种语言，因为他们期望我们年轻的一代能作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然而，我7岁时还是被送到讲盖尔语的学校。这所学校每星期天下午上课。我们在那里学几个盖尔语词组，唱两首盖尔语歌和学跳几步盖尔人舞。但我接受爱尔兰人的教育的时间并不长。1920年，科克市市长泰伦斯·麦克斯威尼老爷死于绝食。我们的老师是麦克斯威尼的嫂子，第二个星期天她没再让我上学。因为我的父母生于美国，所以我就被看作是一个“窄背”——某种不很适于干好工作的人。因此麦克斯威尼学校也不再欢迎我了。

我们十分憎恨英国人。我们爱尔兰人除了拥有特有的狂热自豪之外，还继承了美国人传统的偏见。其他城市里的孩子做警察与强盗游戏，或扮做牛仔和印第安人，而我们则只做爱国者和英国兵游戏。独立战争期间，就在我们邻舍附近，殖民地居民还和英国兵进行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在马萨诸塞州大街上有一家商店，英国兵从阿灵顿进入剑桥时，曾抄近路从那里穿过。我们每天都路过那块纪念死者的石头墓碑。邦克希尔、北方老教堂、美国参议院大厦、保罗·里维尔府邸以及波士顿倾茶党遗址——这些都是熟悉的历史故址。我们感到有一种与独立战争中那些英雄儿女的直接联系。这不仅仅是历史，而且还是真实的生活。

我们邻里百家最喜欢谈的话题之一就是波士顿的北方佬如何在离我住几哩远的地方查尔斯顿将厄苏琳女修道院焚毁。人们经

常谈论那次美国清教徒对那些可怜的爱尔兰天主教修女所采取的可怕行动。每当此时，人们便气愤异常。

在我 10 岁左右，有一天，我听到人们谈了许多那次事件。于是我决定翻阅一下有关史料。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女修道院的焚烧事件竟发生在 1834 年的夏天！但听人们谈论起此事，你一定会以为事件就发生在前天。

我们与英国人的矛盾并不都是发生在过去。波士顿的商店需要雇员，但他们在橱窗上却贴上 NINA 字样，众所周知，这几个字母的意思是“不要爱尔兰人”。每年的复活节，邻里百家的男人们都出来挨家挨户地为爱尔兰共和军募捐。你几乎在每家的前窗上都会看到上面贴有“我献给共和军”字样的张贴物。当然，那时的爱尔兰共和军和今日的共和军大不相同，那时的共和军只是代表爱尔兰统一自由。

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爱尔兰人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民族更喜欢使用选票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在我成丁之际，波士顿政界真正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是爱尔兰人马丁·洛马斯尼。他是从韦斯滕德亨德里克斯俱乐部里脱颖而出的。据说，马丁常常在船上迎接新来的移民，并直接把他们带到登记处让其投票表决；接着又带他们到煤气工厂，给他们找一份工作；最后他把他们带到韦斯滕德，告诉他们目前的住处，等他们挣足钱时再自找地方。

老辈人常常讲述在选举日里马丁如何在投票处迎接他们。“给你选票，”他常说，“我早已替你划下人选了。你进去后，把他们给你的那张选票放起来，把这张给他们。”你出来时，你要把那张没划的选票还给马丁。马丁便再划一遍，交给排队等候的下一个人。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当我初入政界时，波士顿城里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对我们爱尔兰人关闭了。当然，今天说来，那只不过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回忆。正是那些政治家们制造了那些等级差别，

他们把支持自己的人从卑下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给以更好的机会。

我为自己能够在改变这一状况的进程中起到作用而感到自豪。尽管这一改变过程进展缓慢，但曾有那么一个时刻，我确实实地运用了我的政治权力强迫对这种体制作一改变。1950年我作马萨诸塞州议会议长时，有一天，我到剑桥北大街储蓄银行办事。当我迈步走上楼梯时，我看到一个正下楼梯的人眼里噙着泪水。

“怎么啦？”我问他。

“你叫蒂普·奥尼尔，对吧？”他说，“那你一定认识我父亲比利·阿斯金。我们是从伍斯特来的。他过去曾在州议会。”

“没错，我认识你父亲。”我说，“但你怎么啦？”

“因为这家银行答应让我作副行长，结果上周我辞去了另一家银行的工作。但今天早晨我进来时，他们发现我是天主教徒，就不愿再雇用我了。我没有得到提升，反倒失去了工作！”

我感到十分气愤。我跑上楼梯，闯进行长办公室。这个家伙名叫卡斯坦因，是个德国人，他家在剑桥还是北方佬居住的城镇时就开了一家地方煤炭-石油公司。

“卡斯坦因先生，”我说，“我是蒂普·奥尼尔。”

“是吗？你想干什么？”

“我是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议长，也是你的地方代表。我在这里长大。我在圣约翰语法学校上学时，我们每期二都往这银行存一角钱。现在，我所有的孩子都在这个银行立有户头，剑桥北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我们的圣文森特·德·保罗教堂基金也在这里存了33000美元。”

“现在，我明白了，你只因某个人是天主教徒就拒绝雇用他。我不敢相信。我给你时间考虑，到星期一之前你必须改变主

意。如果我的朋友仍未得到那份工作，我将从这儿沿街走到新池帕克韦，告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你这个顽固的狗娘养的杂种不愿雇一个天主教徒。我可以保证你的银行将会发生你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挤兑！”

几天后我再次来到这家银行时，比利·阿斯金的儿子已以副行长的身份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了。另外，这家银行又雇了两名天主教徒，一个是出纳员奥康纳，另一个我现在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自从1927年哈佛大学开学那天以来，我已改变了许多。

我母亲在我九个月的时候死于肺结核，因而我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数年后，我们教区里的一位修女告诉我说，当时我还在襁褓之中，是她来照料我，使我父亲和兄姐得以能够料理丧事。在我整个童年时代，那些修女们知道我没有母亲，常来照看我。

母亲去世后，父亲从诺瓦斯科舍雇了一位名叫罗丝·勒·布兰克的女管家。她是一位讲法语的加拿大人。罗丝对我们尽心尽力，里里外外的家务都由她来操持，成了我、哥哥比尔以及姐姐玛丽的第二母亲。她在我们这儿呆了6年。我长大后讲话带有法音。

我8岁那年，父亲娶了一位玛丽·凯恩小姐做妻子。这次婚姻并不幸福。比尔和玛丽都已是十多岁的孩子了，跟她从未很好地相处过。我最小，继母对我总是非常和蔼——即便我表示讨厌她盛装打扮我，让我戴草帽时，她也对我非常和蔼。

这时人们已开始叫我蒂普——这个绰号来自于我父亲那辈一个受欢迎的棒球运动员。爱尔兰人酷爱棒球运动。他们认为这项运动是美国人从爱尔兰圆场棒球运动剽窃来的。1887年，爱德华·奥尼尔代表圣路易斯·布朗队，以平均击球492点的惊人成绩结束了那个季节的比赛。不过，那一年跑垒也被算作击中点，因

此，现在书中纪录他的平均击球点为 435——这个数目仍然是这项运动有史以来的第二高纪录。爱德华·奥尼尔是一个离垒大师。他常常一次次使对方出界，直到使对方投手最终失去击球的好球部位。因他给对方造成许多犯规的擦棒球，人们便称他为蒂普<sup>①</sup>·奥尼尔了。

在我青少年时代，许多爱尔兰家庭里都有一个叫蒂普的男孩。我在全国各地到处都能碰见叫蒂普·奥尼尔的人。我哥哥比尔曾一度被人们称作蒂普。由于某种原因，这一雅号竟也落到我的头上。但在家里，大家总叫我汤姆。

我父亲托马斯·P·奥尼尔一直对政治感兴趣。1900年，他被选入剑桥市政参议会。那时，地方政治压缩为一样东西——工作。由于当时复杂的官职任命体制，我父亲负责分配教师、警察、市政职员、消防员以及垃圾清扫等工作。

1914年，他参加文职人员考试，当上排水管道工程主管人。这个职务听起来虽然不那么富有魅力，但在那个时候，这个职务十分重要。因为排水管道工程主管人控制着社会上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我父亲的新职位，加上他的政治经验和活跃的个性，使他在邻居眼里成了一个很有权力的人物。

人们称他为地方长官。总有人来我们家向他请教或请求帮助。他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他自己虽然并不富裕，但很愿尽力帮助那些需要他的人。在萧条时期，人们聚集在他的周围，请求他把他们的名字写到受雇人员的名单上，给他们些铺设人行道或翻新街道的活干。这些活不需要付多少薪水而且只是些零活，但对许多家庭来说，已足使他们免于饥饿了。

为市政府工作是不会发家的。不过，我们还总能吃得上饭。即便如此，我们也决不仍掉任何东西。邻里总有人能用得上你的

---

<sup>①</sup> 蒂普为英文 Tip 的音译，原意为“擦棒球”——译注。

旧衬衣、帽子、外衣——甚至旧鞋。我父亲过去常常组织一些人征集食品和衣物，然后再私下里悄悄地把它们分发给那些穷人。这样做既帮助了他们，又不使他们感到难堪。过圣诞节和复活节时，我们常常为贫困家庭准备一些食物篮子，在黑夜放到他们家门坎上，邻里百家非常友好。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真心地相互照料着。

我父亲还是一个绝对戒酒者并担任圣·马太禁酒会主席。他的弟弟杰克在我出生前死于酒精中毒。杰克是一个懒惰的无业游民。我父亲过去常说我叔父使他母亲伤透了心。因此，他，托马斯·P·奥尼尔绝不沾半滴酒。许多年后，在庆贺他75寿辰的宴会上，我才终于打破了他的戒律，让他喝了一杯香槟酒。

我父亲严格守时。他总是丝毫不差地在差10分8点离开家。这时，排水管道工程部门的一个人用马车把他接走。他总是在5点5分回家。每天晚上吃饭前他总要刮一下胡子。在教堂他总坐那同一个位子。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绝对戒酒者，也没有十分精确的习惯。但在其他方面，我倒很象我父亲。他给我的四条重要训诲：第一条是忠实；第二条是生活廉洁诚实；第三条是勿忘对同胞所担负的责任——我是我弟弟的监护人；第四条是永远记住我的出身。这四条训诲我都一一付诸实践了。因此，当人们说我象我父亲时，我总是感到这是对我的赞美。

直到我写这本书时我才明白我父亲还给了我第五条训诲——一条在那时候似乎太寻常、以致过了许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波士顿因政治腐败而名声不好，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来自于我父亲）政治是一种需要诚实和正直的职业。在我们家中，过去把做公务看作是一种极大的荣誉——现在仍然如此。

1912年12月9日，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我父亲在哈佛大学担



任纠察任务时实践了他的准则。当时哈佛大学竟敢雇用一些没加入工会的砌砖工人。我父亲本人是一个砌砖工人，他对自己的朋友，对爱尔兰人，天主教徒，民主党，当然还有工会都忠心耿耿。在我们家任何人都不能穿戴没印有工会标记的衣物。

我父亲有一个朋友，名叫彼得·斯蒂勒，是城里的砌砖工人。彼得·斯蒂勒是一个“卵形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他砌圆形下水道。几年后，我父亲去看望行政机构专员，一个名叫卢皮恩的家伙，看看他是否能把彼得由“劳动者”改为“专家”，这一改动能给彼得提高工资。

“专家？”卢皮恩讥笑道，“呃，任何人都能砌砖。1912年，为交学费，我就在哈佛大学里砌过砖。”

我父亲怒视着他说：“你这个杂种，我在担任纠察时你却跑去砌砖。你会砌什么砖，你这个狗娘养的。你是个工贼！”

卢皮恩没能很迅速地把父亲赶下台，结果，彼得·斯蒂勒的工资却得到了增加。

我父亲非常喜爱体育运动。他很喜欢雷德索克斯职业棒球队，不过他也同样喜欢业余棒球队。“让我们星期六到萨默维尔中学去，”他常说，“丹尼·麦克法登为萨默维尔队当投手。这个名叫芒罗的小伙子为埃弗里特中学当投手。他们一定打的极好。”

球打得真的不错。比赛打了十八局。埃弗里特队赢了，一比零。丹尼·麦克法登直接参加了大联赛。如果那时允许黑人参加的话，芒罗也会去的。

我仍然记得他带我去看的第一次大联赛。那场比赛是在1920年7月1日在芬威公园里举行的。那时我七岁半。入场时，我父亲为我们各交了35美分和15美分。比赛程序单5分钱一张。那天的比赛是波士顿的雷德索克斯队对华盛顿的参议员队。我几乎没想到我一生中会有34年经常往来于这两座伟大的城